網際網路如何影響社會運動中的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
—以台北野草莓學運爲個案研究*

蕭遠
國立臺灣大學

摘　要

網路媒介如何影響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及組織型態？本研究以野草莓學運爲例，試圖探討網路媒介興起對社會運動動員結構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此影響又如何改變了社會運動組織型態。 本研究延伸趙鼎新所創的生態圈概念，主張野草莓學運中網路媒介所動員的是種超越實體空間的「虛擬生態圈」（virtual ecology）。而這種動員方式，使野草莓學運跳脫傳統網絡，在短時間內爆發動員強度，但同時產生人際網絡枝節斷裂（segmented）的參與者，進而造成「無領導的民主行動群」的扁平式組織。本研究呈現了科技媒介、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三者如何相互影響的過程。

關鍵詞：網際網路、社會運動、動員結構、組織型態、虛擬生態圈

蕭遠　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研究興趣包含政治社會學、社會運動、社會組織。曾執行98年度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 本研究原係2008年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編號98-2815-C-002-105-H研究成果，感謝國科會給予本研究經費上的補助，俾利研究之完成。特別感謝台大范雲教授對於計畫不遺餘力的指導。感謝計畫執行期間台大林國明教授、賴曉黎教授給予意見上的協助。感謝兩位審查者對於論文寶貴的意見。感謝所有受訪者熱心的提供意見。最後由衷感謝邱雅雯小姐對於本文細心的校對與訂正。

（收件：2011/6/7，修正：2011/7/6，再修正：2011/8/5，接受：2011/9/2）

臺灣民主季刊

壹、前言

網路逐漸普及的時代，網路媒介逐漸影響了社會運動的領域。在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等地的民主革命中，革命的參與群眾被認爲是透過Facebook、Twitter等網路媒介從而發起運動、散播與更新運動的訊息，網路媒介被認爲扮演動員群眾、組織運動的關鍵角色。

近年台灣的各種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紛紛利用部落格等網路媒介進行活動，架設的網站也常是社會運動發起與動員的基礎。網路媒介在社會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吃重，近年最著名的例子是野草莓學運。野草莓學運是第一個利用網路BBS發起學運，也利用BBS作爲參與者進行學運討論的工具，甚至架設視訊使網路參與者隨時了解活動情形。此外野草莓學運的部落格與BBS大量發出的聲明稿與新聞稿，甚至進行了部分學運走向的討論。在野草莓學運中，網路媒介的重要性展露無疑。

在社會運動的研究中，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組織型態一直被視爲社會運動能否成功的關鍵。然而，有關社會運動動員結構如何影響組織型態的文獻甚少。本研究將探討網路媒介作爲社會運動重要工具，如何影響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本研究嘗試回答以下問題：網路媒介如何影響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充分使用網路媒介的社會運動，其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有何關連？社會運動的科技媒介、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之間具有什麼樣的關係？

在野草莓學運中，我們看見網路媒介具有迥異於以往動員結構的能量。這樣的動員模式使得參與者間過往生命經驗較少重合，難以產生信任而無法形成領導圈。在野草莓學運中，可用「無領導的民主行動群」形容其缺乏領導圈、扁平化、低統合性的運動組織型態。

本研究顯示，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之間有密切的關連。動員結構又受運動使用的媒介影響，影響了運動成員的組成樣貌，進而影響組織型態的發展。是故，科技媒介、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三者之間有邏輯的相關。宏觀

層次上，運動的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深受所處科技條件影響；在微觀的層次上，若不瞭解參與者的生命經驗與人際網絡組成模式，則無法理解爲何科技條件限制下會產生特定的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本研究說明了網路媒介的特質賦予運動參與者的科技條件，並探討參與者的生命經驗與人際網絡的連帶圖譜，以理解網際網路對於社會運動的衝擊。

貳、文獻回顧

網路媒介應用在社會運動是新興的現象，國外文獻的研究也僅有探索性的研究。而國內的相關研究更少，林鶴玲與鄭陸霖的探索性分析是較具有系統性的研究。

林鶴玲與鄭陸霖（2001:5-8）彙整出網路媒介利於應用在社會運動的特性：第一，網路的即時性、大量傳遞、方便轉寄、互動性強的媒介特性在社會運動團體對內聯繫動員、蒐集資料、確認重要議題、形成共識、發展行動計畫，以及對外爭取同情支持等層面上，具有傳統媒體沒有的功能效率。網路使用在時間與金錢上都較傳統媒體成本爲低。第二，網路溝通使物理障礙消除，使跨越地理疆界的聯盟和行動成爲可能。第三，電腦中介傳播由於成本低廉且技術上不易管制，被認爲是更民主的互動媒介，許多人期許它能帶來新的公民社會。最後，網路互動即時而不必同步，使得網路媒介的溝通非常彈性。

在網路的許多特性中，網路提供參與者互動，進而提供參與者形成公眾討論的特性，被許多研究者認爲能增加公民對公眾議題的參與度，進而強化公民社會。Fenton（2008:234-38）認爲，網路與傳統媒介的差別在於網路高度互動（interactivity）及參與（participation）的可能性。此特性使參與者能聯繫動員、蒐集資料、確認重要議題、形成共識、發展行動計畫，及對外爭取同情支持，發揮傳統社會運動抗爭現場的功能。網路可視作另一個社會運動平台，達到發聲、形成論述的目的（Brunsting and Postmes, 2002:547）。而網路不易管制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的特性，使媒介的管理權力掌握在運動者手中，避免產生傳統媒介易被政治或市場力量影響而導致立場的偏頗。Salter（2003:129-31）即指出，網路的使用形成運動者自己可掌握的場域，而保護公民社會不受入侵。

國外學者已注意到網路媒介應用在社會運動的可能性，並且提出案例研究描繪網路媒介在新興社會運動的影響力。Mele（1999:299-306）以Jervay地區爲例，指出社區居民自治與抗爭利用網路的現象。Clark與Themudo（2006:50-54）以反全球化抗爭爲例，敘述以網路爲基底的連帶關係。Earl與Kimport（2009:234-41）也指出，利用網際網路可加速社會運動的實踐，並可在網路提出多樣化的運動訴求。Stein（2009:767）亦研究美國社會運動網站，說明網路媒介如何增加社會運動的資源。國外研究著重網路媒介是否具有應用於社會運動的可能性，及運動應用網路媒介的策略和成果。其研究雖然指出網路媒介應用在社會運動的新興現象，但並未討論網路媒介對於社會運動動員結構及組織型態的影響。

國內對網路媒介應用在社會運動的研究更爲缺乏，林鶴玲與鄭陸霖（2001:31）曾注意到兩者的聯繫，並對1997至1999年使用網路媒介的社會運動進行探索性分析，認爲本土網上社會運動發展經驗中雖不乏小規模勝利，但整體而言，網路仍是配角。單靠網路不足成事，網下的抗爭活動才是社會運動的主角和重頭戲。

然而，距林鶴玲與鄭陸霖研究十年後的今天，網際網路在社會運動的角色逐漸重要，也不再是配角。以野草莓學運爲例，運動初始就是透過網路發起動員，方能在短時間內聚集大量運動者。同時，在林鶴玲與鄭陸霖分析中雖然提出了可信的系統性研究，然而在台灣當時的社會運動中，網路媒介只是運動的輔助工具，並未成爲運動的重要動員來源，也沒有成爲參與討論的重要連絡站。在野草莓學運中，網路不但成爲運動的發起與動員主要來源，更形成高互動高參與的網站作爲參與基礎，這樣的條件是此前社會運動所不具備的。網路媒介應用在社會運動的影響實有重新研究之必要。

總結之，網路媒介具有利於應用在社會運動的特性，並成爲現今許多社會運動不可或缺的工具。網路媒介作爲運動重要工具，實有探討其應用在社會運動後的影響的必要。然而，國內外文獻尚未探討網路對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及組織型態的影響。以下筆者將簡述社會運動理論中動員結構、組織型態兩個面向，並嘗試將網路媒介納入討論。

一、動員與網路媒介

社會運動的動員方式決定了運動可運用的資源，決定了社會運動的能量。所謂動員，牽涉到被動的個體到積極參與的過程（Tilly, 1978:68）。而社會運動動員結構則關注何種社會結構和運動組織結構更利於社會運動的動員（趙鼎新，2007:285）。

1970年代的資源動員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強調運動組織必須要有資源才能動員群眾。運動興起的關鍵在於能否取得資源。資源，除了實質的金錢外，還包含運動組織、大眾媒體、其他組織，甚至政黨的關係（McCarthy and Zald, 1977:1212; Jenkins, 1983:530）。

要動員群眾，運動還必須「構框」（Frame）運動意義，使群眾認同社會運動的論述（Snow et al., 1997:248-50）。Noonan（1997:264-65）以智利婦女運動爲例，發現婦運動員中，構框與論述的意義不可忽視。然而只有構框意義不能保證達成動員。學者發現對議題的同理心並不保證會以行動參與（McAdam and Snow, 1997:172）。Oegema與Klandermans（1997:188）指出，群眾未被動員的可能因素包括同理心的減弱（erosion），或沒有實際行動（non-conversion）。更重要的是，運動動員往往因爲群眾「搭便車」（free-rider）的心態而未成功動員。不滿的群眾希望藉由他人抗爭，以便自己在不付出成本下同享抗爭的果實（趙鼎新，2007:186-89）。

人際網絡被視爲克服此困境的解決之道。Della Porta與Diani認爲，私人的人際網絡是運動動員的關鍵力量（苗延威〔譯〕，Della Porta and Diani〔原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著〕，2002:130-34）。運動組織、政黨、教會、工會等交織成的網絡是激發社會運動參與的重要動力（何明修，2005:104）。Morris（1997:107）以美國南部黑人學運爲例，指出既存在地組織及其人際網絡是學運動員的關鍵。Gould（1997:142）也以巴黎社區爲例，指出人際網絡是居民動員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90年代前的台灣社會運動經驗也如此。如野百合、自由之愛多半以在校既有的社團人際網絡爲基礎，進而發展成社會運動。人際網絡連結對社會運動動員實有關鍵影響（鄧丕雲，1993:82-85, 298）。人際網絡的連帶增加了支持者參與社會運動的動機，而得以克服搭便車的難題。

除了以組織爲基礎的人際網絡動員，趙鼎新強調「空間」作爲社會運動動員的基礎。趙鼎新以中國八九學生民主運動爲例，指出北京大專院校（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食堂、宿舍等地理空間創造了動員的基礎。趙鼎新將這種以空間爲基礎，不同於以既存組織爲基礎的動員模式稱爲「生態圈（ecology）」（Zhao, 1998:1518-23）。

上述研究雖然討論了動員群眾的各種基礎，卻未討論運動使用的媒介對於動員結構產生的影響。網路媒介作爲一個新興可能的動員工具，對於動員結構有何影響？網路使用者可能透過網路活動增強參與社會運動的意願（Brunsting and Postmes, 2002:547）。然而林鶴玲與鄭陸霖（2001:16）對台灣的考察認爲，網路抗爭效果遠不及傳統的現場連署，網路僅是傳統社會運動形式的連絡站之一。何明修（2005:113）認爲網路情境無法形成社會團結，其關鍵在於網路缺乏集體性格，沒有當面互動的情感投入。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幾個研究的案例中，網路媒介只是社會運動的輔助工具。如今網路媒介扮演的角色漸重，動員方式是否轉化，及轉化之後對動員結構影響都可能有巨大的改變。爲了彌補文獻的不足，本研究進行了實際考察。

二、組織與網路媒介

社會運動如何形成組織、管控群眾、形成策略、進行宣傳與爭取資源是

學者關注的議題。其中仍以資源動員論對於社會運動的組織過程討論最多。資源動員論者重視專業化與制度化的組織，認爲其可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專業人士的能力對於運動成敗至爲重要。資源動員論者試圖證明社會運動不能化約爲群眾行爲，行動的參與具有領導者與追隨者的結構化關係（何明修，2005:92-93）。資源動員論者認爲集權而正式化的組織是社會運動的典型（Jenkins, 1983:528）。

始於美國1960年代學生運動的「新社會運動」則挑戰這樣的論點。相對於以工人團體爲主的階級抗爭活動，新社會運動涵蓋了環境、婦權、反戰等訴求（Dalton, Küechler and Burklin 1990:3-4）。新社會運動在「參與者參與影響自己生命的決定」的意識型態下，強調擴大參與圈，以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達成決策，發展出去中心化、開放、枝節化（segmented）的組織型態（Dalton, Küechler and Burklin 1990:7-11）。

值得注意的是，參與式民主的組織型態與領導圈的有無沒有必然的關係。Polleta（2002:112-15, 26）討論了1960至1970年代美國的社會運動發現，當時運動雖強調民主式的決策，仍可能產生領導者。運動強調的是透過民主程序使運動參與者參與領導圈的產生；此外運動中資深而人脈廣的參與者即使退出了決策圈，卻仍常與決策圈的人討論決策，常被其他參與者視爲壟斷權力（Polleta, 2002:201-08）。Joreen（1973）也以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爲例，指出即使組織中缺乏正式指派的領導者，但在非正式場合中領導者依舊存在。從新社會運動中，可看到在參與式民主意識型態下可能有的多元化組織型態。

台灣社會運動組織文獻中，李丁讚與林文源（2003:100-4）以台灣環境運動爲例，提出1990年代的環境運動經歷明顯的組織化階段 。顧忠華（2003:9）也發現台灣社會運動經歷解嚴後的組織化趨勢，社會運動組織開始提供專業服務，處理愈益複雜的經營事務。范雲（2003:185-88）以婦女運動爲例，指出社會運動的組織型態與參與者的生命傳記密不可分。不同生命經驗將影響到運動組織劇碼的樣貌。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鄧丕雲則對台灣八零年代後學生運動的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①] 1980年代的「自由之愛」運動中，採取了「菁英結盟，向下動員」的策略，菁英即爲學運社團菁英。運動成員多被菁英的人際網絡動員，群眾有較緊密生命經驗重合。「自由之愛」也以運動菁英爲領導核心進行決策（鄧丕雲，1993:82-85）。鄧丕雲指出1980年代後的學運特色：

> 集體行動的基本單位是團體。所以，學運團體的萌芽是學運能夠出現的關鍵因素。所謂學運團體，與學生異議團體及改革派社團，三者之間其實有很大的重疊……但學運團體無疑是最重要的（鄧丕雲，1993:101-2）。

鄧丕雲（1993:298-300）的研究清楚地指出校園既存學運團體在1980年代學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根據其研究，1990年代的野百合學運雖也以學運團體爲主，但因運動規模較大，成員組成也較複雜。1990年的三月學運基本上是多個學運團體的聯盟，由此聯盟形成領導圈進而擴大動員。在這樣的架構下「群眾是學運團體所不熟悉的人，同時卻又支持學運團體的領導（在三月學運時，負責決策與指揮學生都是學運團體的人）」。[②]

從鄧丕雲的研究可發現1980年代後的學生運動中，學運團體、異議社團等既存組織扮演了核心角色。運動以既存組織爲核心發起動員。決策也以既存組織成員形成領導圈，主導運動走向。

台灣研究雖討論了社會運動的組織化過程，甚至論述了運動的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之間的關係，卻忽視了運動媒介的使用對運動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可能產生的影響。

---

① 筆者亦針對了鄧丕雲的文獻內容訪談了過去學運參與者，台大教授林國明與台大教授范雲以獲得更深入的資訊。

② 台大教授范雲說明當時以學運團體聯盟進行發起與動員，後來透過大眾媒體擴大，群眾較複雜，以致於必須以學校推派代表的方式決策。然而各校際代表均是學運團體或社團活躍份子，當時雖有民主投票決策，投票者卻是代表各校形成的領導圈。

當前國外學者已注意到網路作爲運動的媒介可能對運動組織型態產生的影響。Peckham（1998:342）以支持與反對信仰療法（Scientology）線上運動者爲例，指出網路高互動高參與的民主化特性使得運動沒有明確領袖，將使議程執行效率低落。Clark 與 Themudo（2006:70）則以反全球化網站爲例，提出網站採取扁平化的組織型態，鼓勵多元民主參與而無上下層級關係，具「非科層化」特性。然而上述文獻雖然注意到了網路媒介對於運動組織的重要性，卻僅討論運動網站的管理方式，並未討論運動現場的組織型態如何受網路媒介影響。

在台灣，關於網路如何影響組織的文獻更少，陳信行（2008）以樂生運動爲例，認爲網路工具使社會運動組織非但沒有朝向資源動員論所述的方向，反而類似新社會運動中強調民主參與的扁平化組織型態。本研究希望說明網路媒介與運動組織的關係。

總結以上研究，有關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的理論相當豐富。但有關運動媒介，尤其是網路媒介的使用對於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的影響仍十分欠缺。國外雖有部份研究，但著重網上虛擬空間呈現的管理模式，並未討論運動抗爭現場的組織型態。台灣文獻則忽視網路作爲具有高互動、高參與特性的媒介如何影響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及組織型態。本研究欲探討網路媒介將對社會運動動員結構、組織面向將產生何種衝擊，以補國內外文獻空白。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選擇野草莓學運作爲深入研究的案例。

野草莓學運是台灣第一個由網路上發起動員的社會運動，並首創利用即時視訊轉播現場，是網路高互動與高參與的特性應用在社會運動最好的範例。網路媒介在野草莓學運展現的動員力量是前所未見的。野草莓學運是當前網路媒介與社會運動結合的最佳案例，可了解網路媒介的使用對於運動動員結構及組織型態的影響。以下將先簡介野草莓學運，再說明本研究採取的方法。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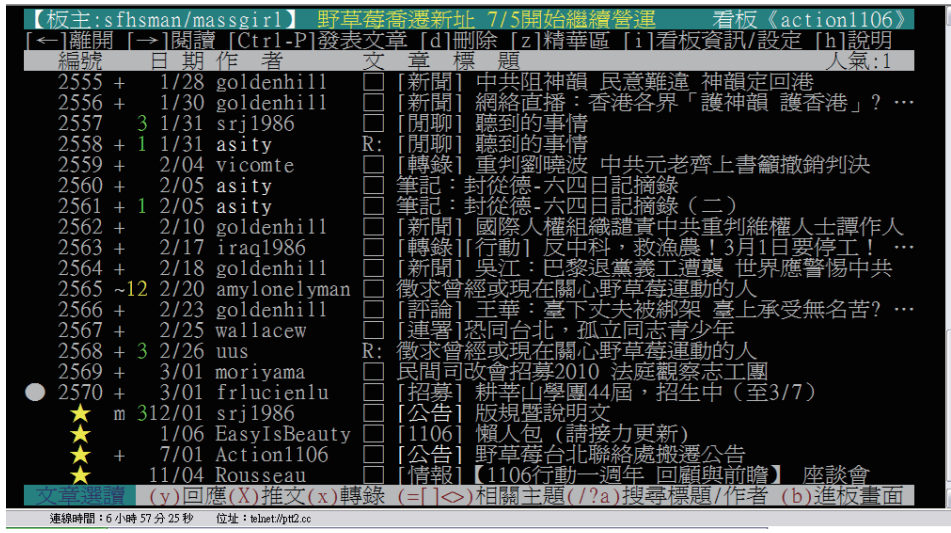
野草莓學運於2008年11月，由眾多位師生共同發起抗議中國官員陳雲林訪台時，臺灣政府打壓言論自由及警察執法過當等措施。運動原定義爲公民靜坐活動。發起時台大教授李明璁將抗議聲明張貼在其批踢踢兔（以下簡稱PTT2）版上，歡迎任何人至行政院前靜坐。此聲明並無特定受邀對象，然運動現場竟多達五百人聚集。由於運動參與者多爲大學生，故後來轉型爲學生運動。

行政院前的靜坐遭政府驅散後至自由廣場繼續進行，歷時一個月。相較於過往多僅維持數日的學運，一月之久相當罕見。除台北有運動外，全台各地也有野草莓學運「遍地開花」，包括新竹、台中、嘉義、高雄等地。野草莓學運的訴求在靜坐期間並未達成。靜坐結束後部分參與者利用學運資源轉型爲NGO組織，現稱「野空間」。然其以支援其他社會運動爲主，並未再發起運動。由於除台北場外，各地甚少使用網路媒介，且運動主導權也在台北場，因此本研究以台北場爲主要對象，故若未特別註明，「野草莓學運」一詞即代稱野草莓學運台北場。

野草莓學運在網路媒介的運用上有其歷史意義。首先是運動參與者多透過網路募集，運動發起者是透過PTT2號召成員，而運動參與者更在PTT2、部落格成立專屬運動的網站供網路使用者交流。PTT2更是運動參與者重要交流平台，可張貼與回應文章、傳達現場動態、討論媒體報導內容等。野草莓學運的PTT2站在運動結束後仍持續運作至今日。野草莓學運亦架設了台灣學運史上第一個網路直播平台。

野草莓學運使用的網路工具相當多元，包括PTT2、部落格、即時視訊。當中以PTT2的功能最顯著。PTT2是BBS的一個站台。BBS（Bulletin Board System，電子佈告欄系統）性質類似網站上的討論區，供使用者發表與回應文章。回應文章有種特殊形式「推文」，即在文章下方以幾句話回應而非字數較多的文章，可供BBS使用者即時發表回應，此特色相當符合網路高互動高參與的特性。BBS使用族群多爲年齡層較輕的大學生。野草莓學運使用的PTT2站先後有「camduck」、「chinafashion」、「action1106」三個版面，其中

「camduck」版原爲台大教授李明璁的個人專版。BBS的使用介面如圖一。



圖一　BBS的使用介面

資料來源：批踢踢兔（2008）。

本研究採取的方法有三，其一、深度訪談。本研究透過訪談野草莓學運的幹部與一般參與者，以期瞭解野草莓學運的發展過程、動員結構、組織型態等面向，共訪談參與者21人（見附錄二）。③ 雖然全台各地都有野草莓學運出現，但除了台北場之外，網路媒介對運動的影響並不顯著，因此研究的重點放在野草莓學運台北場大量使用網路媒介可能造成的影響，而其他縣市則作爲參照對比。④

③ 爲更瞭解過往的學運，筆者亦訪談80年代學運「自由之愛」幹部台灣大學教授林國明；以及曾任野百合學運總指揮，台灣大學教授范雲。選此二案例是因有文獻描繪其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筆者可以再利用訪談進一步瞭解細節。限於筆者資源有限，無法花費大量時間探索近十年運動的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故選自由之愛及野百合學運作爲參照案例。

④ 爲了對台北以外的野草莓運動進行初步的瞭解，筆者亦訪談了野草莓台中場、中興大學教授楊翠，以及野草莓高雄場的三位同學。詳細訪談對象請見附表二。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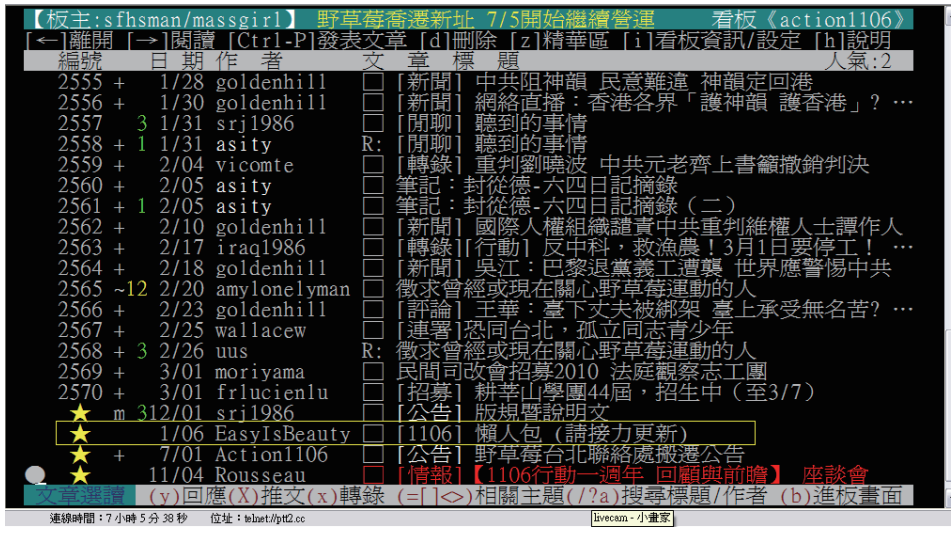
臺灣民主季刊

其二是筆者的參與觀察。野草莓運動期間，筆者曾多次在現場觀察紀錄，熟知野草莓學運的運動過程。透過筆者第一手參與觀察的經驗可輔助對資料的判斷，以及對於研究問題的瞭解。

其三是內容分析法。筆者蒐集野草莓學運在網路上的聲明稿、討論串、文宣、影片等文本資料。此外，不少參與人士也提供了野草莓學運的會議記錄、組織架構圖、傳單等資料。透過分析第一手的運動檔案，更可清楚掌握野草莓學運的實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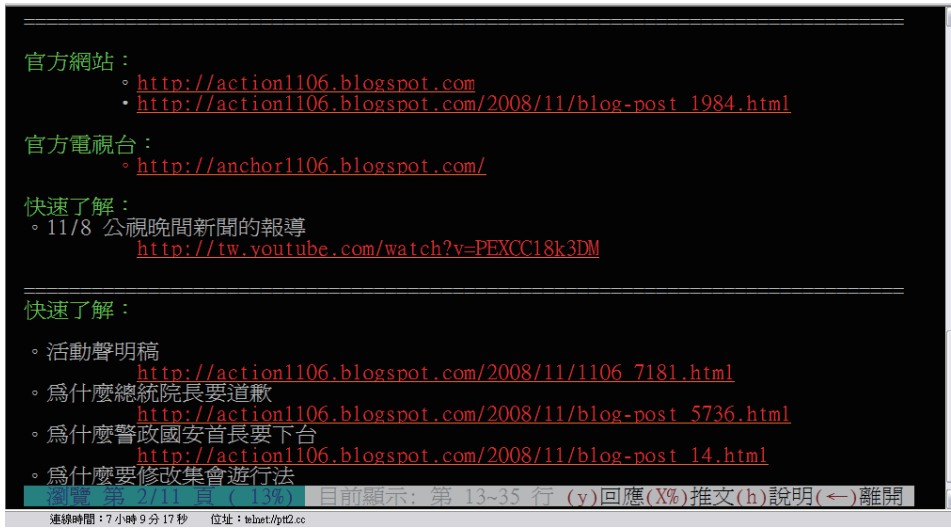
肆、分析與討論

野草莓學運所使用的網路工具中最具有傳播資訊功能的是PTT2。運動發起消息、運動相關訊息都在PTT2上公告與即時更新，PTT2更成爲運動資訊的重要發佈工具，在網上可利用網友整理的「懶人包」（如圖二、圖三）迅速瞭解



圖二　野草莓學運BBS畫面

資料來源：批踢踢兔（2008）。



圖三　置底的懶人包

資料來源：批踢踢兔（2008）。

運動主要訴求及重要論點，懶人包配置在PTT2版面的最下方，只要是對運動有興趣的人士，很容易在PTT2上瞭解野草莓學運的來龍去脈及運動訊息。

研究訪談時發現超過七成受訪者最初是從網路上獲得訊息，進而參與運動。當被問到從何知道運動時，受訪者己說：「那個時候就有個同學丟我MSN，叫我加那個版（指camduck版），我問他做什麼，他說你先加去看就知道了」。另一受訪者也提到自己如何加入運動：「就看網路看到的，就李明璁老師的版……本來就有在看。……後來李明璁他們那個出來，看了就覺得隔天應該就會去了」。

如何使一個訴求的潛在支持者轉化爲行動者經常是社會運動學者長期關注的議題。網路使潛在支持者獲知運動基本資訊，使這些人有參與運動的「門道」。在PTT2上可見到有網友提出對運動的疑問，並獲得其他網友迅速回覆。網友kaca在PTT2上提出運動時機點是否因正值民進黨活動而過於敏感的問題。此問題在發出一分鐘內即獲得了12人正方論述的回應。因爲PTT2提供參與者高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度互動特性，使網友的聯繫成爲可能，降低潛在支持者轉化爲參與者的門檻。網路媒介使得運動的同情與支持者變成行動者的可能性大爲提高。

雖然網路是野草莓學運散播基本資訊的重要工具，但網路上的參與只是言論，若要影響運動的行動或論述，只能透過親臨現場來達成。在運動中網路媒介只提供資訊，而不讓網友透過發言參與運動。從PTT2站上的發言內容可瞭解上述現象，在PTT2上有許多網友提出了對運動的建議或批評，但很少獲得野草莓學運幹部的回應。⑤ 網友camaron就在PTT2上建議修正運動的訴求，並激起十餘位網友討論，但並未獲得任何學運幹部的回應。本研究訪談的幹部也無人表示曾上網回應問題。網友就算在網上得到參與者的回應，多也是邀請發言者來現場討論。換言之，網路上的意見對於運動走向影響力微乎其微。受訪者丁就表達了自己對BBS的感覺：「就是知道學生在做什麼事情，但是不知道整個運動現在是到怎麼樣，到後來我覺得這個運動蠻一頭霧水的」。

筆者詢問許多運動幹部對於網路意見的處理方式，發現幾乎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 幹部酉表示：「所有在裡面做事的人沒有時間上B（指BBS），然後網路上的鄉民（指網友）就覺得說你爲什麼不好好回覆網路上的問題。那個資訊爆炸是個很大的問題」。而一名媒體組幹部也說明媒體組發言對象主要是報紙電視而非網路意見。筆者認爲，網上意見對現場影響力低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網路開放網路使用者參與的特性，使網路上短時間就有爆炸性資訊量且內容紛雜，難做系統性整理，故很難被參與者理解。受訪者巳的發言可勾勒此現象：「我會覺得在廣場的學生並不知道外界在發生什麼事，有種資訊焦慮感……會焦慮，尤其經過那麼多問題，財務問題、抹綠……但會回的東西就非常雜亂」。其二是幹部處理現場事務耗時甚多，對外發言也只能夠針對報章電視回應，現場參與者根本無暇照顧網上意見。是故，現場參與才是運動主體。

⑤ 野草莓學運中並未嚴格限定哪些參與者爲幹部，但在運動中參與者仍會習慣性將某些積極的參與者視爲幹部。本研究所稱的幹部，是指涉各組工作人員中積極參與的角色（常常是某組組長）。

學運的決策模式可印證上述現象，當重要議題進行時，網上不提供網友影響決策的可能，影響運動決策的是現場的投票。以野草莓學運最常出現的「去留問題」爲例，先在PTT2站上發佈邀請，接著由現場參與者討論後投票。同時根據筆者的參與觀察，現場討論時沒有任何發言者引用網上意見提高發言的正當性。

是故，網路世界與運動現場是隔絕狀態。網友不僅無法參與決策，其意見甚至傳遞不到現場。現場參與者無暇處理網路上眾多雜亂的意見。在野草莓學運中，網路參與不具有取代現場參與的可能性。

以下案例可爲上述現象作說明。一位常在網路上參與討論並享有邏輯清晰美譽的受訪者卯，在被筆者問及網上發言經驗時表示：

> 我爲什麼後來決定殺到廣場上，因爲我發現網路根本沒有用。因爲廣場上後來已經忙到沒有時間理會網路意見……你一看就知道講話的人全部都不在廣場上，變成是有點像是平行的。網路上的人叭叭叭叭談然後給一堆意見，廣場上幾乎沒有人回應的嘛。因爲廣場上意見就夠多了，麻煩就夠多了……這也是後來爲什麼我決定到廣場去。在網路上跟一堆根本不是在廣場的人聊，有什麼好聊的，乾脆自己到那邊去。……一開始還有希望廣場上的人會回應，後來他們忙到沒什麼回應了，我就知道說，唉優，根本是變成兩個世界了嘛。很多人很焦急的在網路上問，但都沒有回應嘛。我就知道說他們根本沒有心思在顧網路。

一、野草莓學運的動員結構

野草莓學運於2008年11月6日發起，當天晚上在PTT2出現一篇共同宣言號召翌日在行政院前著黑衣靜坐。隔天除共同發起人外，出現數百人到場參與。在11月7日警察驅離群眾後，運動轉至自由廣場繼續進行且人數仍眾。據筆者觀察，參與成員不斷替換，幹部也未常駐現場，有些甚至失聯。11月12到15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日，因天氣不佳加上大學期中考，參與人數銳減。白天約十數人，晚上開大會時人數則增加到數十至百人不等。每天與會人員都不同，很多人開完大會就離開現場，幹部則輪班留下守夜。時至12月7日的大遊行又達人數高峰。運動部分幹部原希望遊行後結束運動，但有部分人不願撤場而留下，已經少至個位數。至12月11日警察強制拆除現場並驅離群眾後，運動結束。⑥

社會運動的文獻，往往強調既存組織在運動過程扮演的重要角色。然在野草莓學運中，學生社團的蹤跡幾不可見，社會團體也未以組織名義參與運動。即使具有社會團體身份的參與者，也不特別表明此種身份。

工運團體秘書長，同時也參與運動的受訪者辰就說：

> 我一開始不太敢講話，因爲我不是學生，而且我是專業的運動工作者。所以如果我的角色被凸顯，那就很可能會被形容成『你看，有工委會的人滲入操作。你看，有工會的人進入操作它。他想要收割什麼利益什麼的』因爲這個是學生的運動。

野草莓學運的動員結構，並非由既存組織聯合而成，而是許多獨立個體集結成的運動。從運動的發起過程可觀察到運動欠缺既存組織扮演重要角色的現象。野草莓學運是透過PTT2上的行動聲明發起，網路上連署都稱「共同發起人」，而非由既存組織聯合發起。這些「共同發起人」，僅出示學校、系級與名字，以個人身份參與發起過程，並未透過既存組織的名義參加。⑦

既存組織也未在運動的動員過程展現力量。筆者的訪談對象中，無一是由既存組織招募而來。受訪者多半在網上看到運動資訊後，決定參加或再拉攏友

⑥ 過程由筆者自行整理。

⑦ 雖然最初討論行動策略時有少數台大濁水溪社成員參與，但也只是討論圈的一角，其他師生則是個別的個人。甚至，這些人也沒以濁水溪社的組織名義參加。台大學生會的幹部雖在學運第一日集體參加，但也未積極參與運動走向的決策。運動的發起中，既存組織的影響力並不大。

人參與。前文提到，網路具有散播運動基本資訊，降低運動參加門檻的作用。參與者戊提起自己的經驗：「就前一陣子新聞都有報（關於警察執法過當的事），後來看到那個版，就想說（跟室友）一起去……就室友告訴我，我問他在哪裡看到，他說在camduck看到」。

筆者對PTT2的內容分析也印證了此現象。PTT2上的推文中，時可看到網友表達參與意願或者拉攏同好參與的發言。在行動聲明系列文中，網友amos0430即發言：「樓上（指上面推文的網友）一起來阿　我四點開始＝＝」。網友EvenLee也表示：「老師，請問如果被抬走還會試圖回去繼續靜坐嗎？希望大家撐得到六點的下班時間，我也想加入」。野草莓學運的動員結構，並非以既存組織爲重要基底，而是以網路爲重心。PTT2提供網友即時互動的媒介特性，使得在網路上面即可串連動員，而不必透過既存組織。

從發起者之一，台大教授李明璁的訪談可看到網路在運動動員結構中的重要性：

> 我們一開始就只是討論到的程度就是在於怎麼樣可以和平理性並且安全地完成這個活動，然後如果衝突應該怎麼辦。至於決策機制該怎麼形成當時確實沒有討論。沒有的原因並不是一開始就希望寡頭，是因爲一開始根本沒有預料到人會這麼多，沒有想到。……本來糾察隊當然一開始有設想，可是沒想到人來了那麼多，所以需要更多的糾察隊。

由於運動的動員並非由任何組織領導規劃，而是網路動員，因此運動的發展自然超出發起者的想像。長期參與者乙提出了他的觀察：「在這次運動中，看不到過往次級團體的影響力」。

（一）「初次參與」的參與者

本研究同時發現，野草莓學運的許多參與者算是初次參與社會運動。參與者庚即談到：「以前在大一大二是有參加過我們學校新聞人這個社團，也不知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道算不算異議社團耶，就比較是關注校園議題，裡面還蠻多日常瑣事的。……參加學生運動還是第一次」。參與者辛也表示：「以前頂多參加過圍陳，但也只是去一下下而已」。即使擔綱幹部的參與者，很多也是第一次參與運動。另有部分幹部雖參加過社會運動，卻是首次擔任影響決策的角色。曾任決策小組的受訪者己就表示：「第一次（參加社會運動）阿，也沒參加過什麼公民組織之類的……以前沒有參加過阿，沒有那種體驗。那是一種經驗，跟辦活動眞的差很多」。

上述現象可從幹部的遴選方式窺知一二。野草莓學運的幹部並非由組織推派具備社會運動經驗的參與者擔任，而是在運動現場徵求自願者。曾任決策小組成員的受訪者己就談起了決策小組成形的方式：「那個時候就是我們一群人上去，然後說我們自願當決策小組，就那時候問說願意當的就舉手。後來過了第二天第三天，就換了一批人，然後那些人就問說爲什麼是你們這些人當決策小組」。一名媒體組幹部也說明媒體組幹部並非以專業能力或運動經驗爲門檻，而是以意願作爲參與或進入決策圈之條件。曾任論述組長的受訪者午也表示論述組沒有人談到自己的運動經驗。

初次嘗試是很多人參與者共同的經驗，也給予不少受訪者特別的體驗。受訪者丑表示：

> 會得到一些刺激，或說一些價值吧，就是對於公共事務參與的價值阿，或者說對於不了解事物的好奇阿，要用怎麼樣的態度來處理這樣的事情。或是怎麼樣去說服別人阿，會比較知道這種技巧吧……說服跟學運能力。後來我會覺得這種事情很重要。……會比較知道怎麼下手。我（如果）對這件事情很有看法，常不知道怎麼開始。這是要學習的。

上述現象極可能是網路動員的結果。網路提供資訊，降低了參與運動的門檻。因爲很多人是上網即來，而非透過既存組織動員，自然不是運動的老手，而是初次參與者。網路動員的特性使很多人即使不是社運界出身，也能參與運

動甚至擔任要職。受訪者酉觀察到：「來這個運動的人，很多都是帶有跟這個運動價值重合的脈絡，但這個運動很特別的是，這個運動讓很多不是在這個脈絡的人也站出來……那個脈絡不見得跟社會運動有關係」。相反地，若運動是以既存組織爲基礎，則參與者理應很多是組織人士而非初次參與者，幹部也應以既存組織的領導者爲主。野草莓學運中並未看到上述現象，這可以說是網路動員的特質之一。

（二）「互不相識」的參與者

此「互不相識」並非指參與者間完全沒有認識的人。但對一個野草莓學運參與者而言，運動中原本就認識的人可能很少。不僅不同學校出身的參與者互相不認識，同校參與者也常有相同現象。

上述現象可以從一般參與者與幹部的互動來註解。野草莓學運的參與者，往往原本不認識幹部。受訪者庚表示：「沒有（認識任何野草莓學運的人），就只有某某某（人名），其他就沒有了」。另一受訪者辛也說：「我後來都是自己去啊，這才是孤單的地方吧，在那邊的人有一部份就原本就認識，像我這種單獨的就有點不太知道該怎麼辦……簡單的來說那邊沒有一個我認識的」。

不僅參與者間可能不認識，幹部間竟也呈現同樣的狀況。很多重要幹部參加運動前根本不認識其他幹部。曾擔任野草莓幹部的受訪者甲被問到與其他幹部過往的交情時表示：「誰是我本來就認識的……（停頓一會思考）……ABC（列了兩三個人）……就沒了」。曾任決策小組的受訪者己也說：「沒有（認識當時決策小組的人），因爲決策小組的人大部份都不是台大的」。曾任決策小組，後來轉任行政組幹部的受訪者寅也說自己原本不認識任何幹部。

上述現象極可能是網路動員的結果。臺灣過往社運中，很多是透過發起者的人脈（或是發起的既存組織的人際網絡）邀請自己組織網絡內的熟人參與運動。相對而言，網路媒介具有向不特定對象散播訊息的特性，只要上網看到運動資訊，就成了受邀對象，而非以特定人或組織爲中心向外動員。由於網路向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不特定對象動員的特性，使得運動參與者中有許多「互不相識」的參與者。

整體而言，野草莓學運的人際網絡可以用「枝節斷裂」（segmented）來形容：也許某些參與者原本認識某些參與者，但這些人僅佔整個運動組成的一部份，另外可能又有一群原本認識的參與者群體，然而這兩個群體可能在參與運動前完全沒有交集。

（三）虛擬生態圈的動員結構及其影響

綜言之，野草莓學運中網路媒介可不透過任何既有人際網絡的基礎進行動員，並在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既存組織的動員力量在運動中相當欠缺。上述的動員結構造成了兩個現象：其一是運動中很多初次參與者。其二是許多參與者可能互不熟識甚至互不認識，形成枝節斷裂的人際網絡。

過往動員理論，多強調以既存組織爲基礎的人際網絡動員。然而網際網路完全不需依賴既存組織，而具有動員的力量。以網路媒介爲基礎的動員結構可視爲社會運動動員模式全新的一種型態。

網路動員的方式可與趙鼎新理論中，空間作爲動員結構相對照。趙鼎新將以地理空間爲基礎的動員模式形容爲一種「生態圈」（ecology）（Zhao, 1998）。在以地理空間爲基礎的生態圈中，人們產生信任並參與運動。而以PTT2爲例的網路空間，同樣具有讓空間內的參與者產生信任，進而參與運動的可能。網路空間可視爲一種新的生態圈，而非傳統的組織動員。然而網路空間的生態圈與趙鼎新理論中以地理空間爲基礎的生態圈相比，其動員的成員間的歧異性更大，連帶更爲微弱。趙鼎新理論中描述的食堂、宿舍等動員基礎畢竟還有物理空間上的限制，動員來的人幾乎屬於同一大專院校。但野草莓學運的參與者，除了具有學校來頭各異的參與者，更有部分社會人士。正如林鶴玲與鄭陸霖（2001）指出的，網路具有超越物理障礙的特性。而網路不限定任何身分使用的特性，使得網路可向大量不特定對象發出運動邀請，而使各地理位置、不同生命經驗的網路接收者都能被動員，而使參與者間的連帶更薄弱。

網路的動員模式，雖有類似於趙鼎新生態圈概念的性質，但又具有超越物理空間限制、且向不特定對象動員的特性，卻同樣可產生足以動員支持者的信任。筆者將網路空間形容爲「虛擬生態圈」（virtual ecology）。虛擬生態圈不但獨立於既存組織而具動員能量，還跨越物理限制，且向不特定對象動員，而發揮動員效果。野草莓學運就是虛擬生態圈動員力量的展現。

虛擬生態圈的空間中可以產生信任，是其發起動員社會運動的基礎。正如趙鼎新的生態圈中人們彼此互動而產生信任連帶一樣，虛擬生態圈提供了網友高互動、高參與的空間，產生了信任連帶。這種信任使得網路上的參與者在面對社會議題時產生了共同感，而成爲發起動員運動的基礎。

二、野草莓學運的組織型態

野草莓學運經歷了幾次組織變動，也沒有明確組織章程，因此野草莓學運的組織結構其實不明確。以下介紹常出現的組別。

大會是最高決策層級。大會每晚舉行，由現場的所有群眾構成。大會決定的事情將成爲整個運動的最高指導原則。行政組則統合各組資源，執行大會決議。媒體組負責撰寫並發佈報章電視的新聞稿，同時管理野草莓學運部落格。論述組初成立時負責撰寫媒體組的新聞稿內容。但雙方協調過程不佳，致使媒體組後來自行撰寫新聞稿。後期論述組以鬆散方式整理對野草莓學運的意見，並回答網路上的問題。主播組操作野草莓學運即時視訊並以聲音播報動態。庶務組與財務組則掌管物資與經費。⑧

在一個月的活動中，其組織架構不斷地變動，但呈現的趨勢是組別與組別的統合性變低，一直未出現足以決策的領導圈，而趨向由全體投票的大會負責表決與決策一切事務。

運動第一天曾將抗議群眾分成20個組，每組推派代表組成決策小組。但翌

⑧ 上述組別敘述由筆者經由參與觀察與訪談記錄自行整理。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日許多組代表消失，以致於現場必須重新徵求自願者組成七人決策小組。此小組實際上無法決策，僅負責議程安排，成員組成也不固定。於是七人小組有人先行離開，小組運作一天後崩潰。之後由現場參與者重新成立行政組負責「執行」決議，決策工作全交由「大會」執行。其他各組也在這段時間陸續成立。經過一週的持續靜坐抗議後，行政組部分幹部希望結束運動，但許多只參與大會的群眾並不願意，因而發生了行政組與大會之間的衝突。之後，行政組改組，許多幹部退出，由另一批自願者擔任行政組幹部。之後一週內，靈堂組與蓋塔組等在未經幹部同意下成立並進行蓋塔及蓋靈堂等工作。後期因要準備大遊行，各組間的整合漸密切，組別界線逐漸模糊。

（一）直接民主的決策模式

從抗議群眾集結行政院前，野草莓學運就一直以現場群眾投票的方式決定重要事務，舉凡遭驅離後是否轉戰自由廣場、撤場與否、政治人物來訪時如何應對，都由現場參與者投票決定。

運動中期發展出最高層級是由所有現場參與者組成的「大會」。運動現場設有提案欄，任何人只要將提案張貼提案欄上就會列入大會議程。討論時，提案者會說明內容及原因，並在大會討論後交付表決。表決決議具有最高效力，野草莓學運的工作人員必須執行之。換言之，野草莓學運的幹部與工作人員無法違抗大會決議，集體群眾決策的「直接民主制」遂成野草莓學運的特點之一。

前文雖提到野草莓學運具有「幹部」，但也只是較積極參與的工作人員。每日大會後幹部會另開幹部會議。雖然幹部多由各組組長組成，但想參與的人也可參加，並不具排他性。幹部會議的內容不但不能違抗大會的決議，甚至幹部間的議案也須以提案方式獲得大會授權後方可執行。舉例而言，12月7日大遊行的籌劃中，一名遊行重要規劃人在受訪時談到遊行籌劃雖先規劃好，但還

是必須交付大會同意才可執行。換言之，幹部不具決策權力僅有提案能力。幹部與一般參與者在重要議題的決策影響力上幾近等同，幹部的想法並不能左右運動方針。除了可訂定大會決議的施行細則外，幹部並無多餘權力。[9] 受訪者丑描述了此共識：「後面的共識就是讓我們自己來主導這個東西（指運動），不要怕別人來加入。人應該是越來越多，越來越豐富才對」。受訪者甲也說明：「我們（指幹部）如果希望這個提案成功的話，就一定要讓這個提案到大會裡面討論，那可是像這個提案進到大會提案裡面後，大會不一定會同意……幾乎所有事情都要交給大會，好啦，至少我可以決定今天要吃什麼便當」。

直接民主的力量在決策小組改組爲行政組的事件中便清楚展現，運動曾成立「決策小組」，理應負責決策，幾名決策小組的成員受訪時也表示此舉也獲李明璁等教授的支持。但實際上，決策小組根本不敢決策，而僅作提案流程規劃的工作，重要事情依舊交付群眾表決。最後決策小組功能失效，決定改組成爲「行政組」，表示其只負責「行政」工作而不決策。

幹部不能決策的現象可由另一事件得知。當時多名幹部達成共識，希望能籌畫撤場，豈知消息走漏，一名非幹部的參與者在廣場叫囂，並質問他們是否打算不經群眾同意而收場。大會上這名參與者獲得了現場參與者熱烈的迴響，打算收場的幹部雖然不敢當場承認，但之後就沒人再提這件事。又過了幾日，行政組面臨第一次改組，很多當時提議收場的幹部從此退出了幹部圈。此事件雖無明顯權力鬥爭，但幹部無法決策，群眾意志的力量展露無遺。

（二）不具領導正當性的幹部

野草莓學運不僅在決策時以全體參與者意見爲依歸，就連非決策時，群眾與幹部之間的權力關係也是平等的。群眾與幹部沒有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

[9] 雖然幹部只能訂定施行細則，但運動的維持還是需要這些詳細細則的擬定與執行，故施行細則對於運動的維持不可謂不重要。這些事務若無人要求則不必提交大會，由幹部與工作人員決定之。但若群眾不滿要求，則必須交付大會討論。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係，而是共同參與運動。

非幹部參與者並不認爲幹部是領導運動的主體，甚至有些參與者不覺得有領導圈存在。一般參與者庚提及：「我不覺得幹部可以決定一切的事情耶……其實還是要大家討論再來決定」。另一受訪者不但不認識幹部，且根本不認爲需要被領導。受訪者甲敘述了群眾對幹部不滿的公開反抗：「只要是ABC（幾位野草莓學運的幹部）上去，不管他們說了什麼，反正就是會被噓……可能他們不討喜吧」。

幹部們對自己的定位也非領導者，而只是運動參與者之一。野草莓學運雖換過多次幹部，但幹部始終堅持自己只是參與者。長期參與者乙表示：「後來行政組來出現，……介紹幹部什麼之類的，然後那個時候行政組就已經自我定位是：群眾是腦，我們是齒輪。……群眾要決策就對了」。運動初起時，運動組織尚未成形，當時台大教授李明璁相對具有較大名氣，然而李明璁說起他當時的理念：「這個運動本來就不是誰發起響應的問題，而是共同發起。既然是共同發起，那就是大家共同發起，大家共同擔當，共同決定、選擇、承擔」。一受訪者丁也表示：「我覺得我們像工具，因爲實際決策的可能是這個大會……有時候媒體組會讓我有這樣的感覺，我們會覺得尊重整個來參與的同學的決定……然後要是我們不幸又被（大會）去留表決一次，然後決定留下來……我會決定留下來，即使我不會支持留下來」。一名曾是決策小組的受訪者也表示決策小組及幹部根本不敢領導，野草莓學運的幹部並不定位自己爲領導者，只是投入的心力較多的參與者罷了。

李明璁提出了他的觀察：「沒有任何一個老師有權力決定這場運動。不只老師，沒有任何一個學生可以決定這場運動」。當然，李明璁的看法也可能被認爲是一個具意識型態的政治陳述，但從決策小組的崩潰，以及前述行政組的第一次改組，可看到這個運動中沒有任何人或群體具有領導的正當性。

（三）各自為政的小組

野草莓學運內部各組在運作上，不但沒有上下權力關係，甚至是互不干預，各自爲政。這種鬆散的組織結構可從下面幾點看出：

首先，是各組成立的過程並非先經由現有組織幹部規劃成立，而是想要成立組別的人自己找人，有了初步人員，再獲大會核准即可。財務組、庶務組等組的成立過程都是如此。

受訪者甲就以財務組的成立爲例：「6號就是有人要先走，那時候他們已經開了一個礦泉水的箱子當作募款箱，可是那個時候是旁邊一堆人沒有可以處理之類的，然後就成立的」。曾任論述組長的受訪者午也談到論述組類似的過程。

最有趣的莫過於靈堂組的成立。野草莓學運進行到第三週的時候，曾在運動現場製作了一個「人權的靈堂」，目的是藉由民間儀式來象徵台灣人權已死。此一仿造眞實靈堂的現場裝置不但開放民眾自由弔唁，甚至連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等政治人物也前來參與公祭。但負責這麼重要活動的執行小組，卻是在所有幹部完全不知情的狀態下成立的。

筆者的參與觀察有幸目睹靈堂組成立的過程。靈堂組成立，是一群參與者，認爲野草莓學運現有組織沒有在做事，因此決定成立工作小組先做事再說。重要成立人丙說：「不要在這邊一直開會，不管現在誰理論上有那個職位分派事情，先不要管他……大家有在工作比較重要，其他人就不要管他。……我們就是把大家拉起來做一點事情，而不是讓大家在那邊不知道要做什麼……剛開始就跟行政組完全沒有什麼聯繫」。類似靈堂組的還有「蓋塔組」、「小屋組」，都是在未經野草莓學運既有組織規劃下成立的。野草莓學運的組織架構極不穩定，隨時可能有新組別出現。無怪乎受訪者多表示這個運動組織非常鬆散，甚至許多幹部對組織架構理解也不盡相同。在許多受訪者眼中，靈堂組、蓋塔組根本不是野草莓學運組織架構的一部份。⑩

⑩ 更有甚者，有一名受訪者給予筆者一張組織架構圖，當中有其他參與者甚至幹部根本不知道的組別（如人力資源組、串連組）。由此可見野草莓學運組織缺乏統合的程度。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不但組別成立超出既有組織控制之外，各組成立後各自爲政，沒有統一的指揮。一名受訪者就說媒體組運作實況有如派閥，具有高度自主性。即便行政組的人員，若有想法，亦不能命令指揮各組，而僅能用私人「聊天」的方式說說看法。媒體組幹部丁就談到：「就算行政組（的人）有他的想法，他不是以自己是行政組的身份叫你怎樣怎樣」。曾任論述組長的受訪者午亦表示：「（論述組）自己獨立運作比較多，因爲那個組（指野草莓組織）一直沒有一個領導核心，沒有像一條鞭這樣的中心……偏向這樣……每天可能開會，看有什麼樣的提案這樣，它只是一種建議式，沒有說你們就要去生什麼ABC」。靈堂組更是從頭至尾都沒有參與幹部會議，不必與其他組別會商，自己籌措靈堂事務即可。

綜上所述，運動的組織型態呈現權力分散的扁平式結構。在實際層面，決策模式上是由全體參與者共同決定，而非少數集團決策。在象徵層面上，一般參與者並不認爲有被領導的需要，幹部也不認爲自己有領導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野草莓學運的組織型態並沒有一個上下的層級關係。

組織內部同樣呈現權力分散的現象。各組不但權力對等，甚至成立與運作也都不受既有組織影響，各組間並沒有很好的協調機制。這樣的運作模式，使得運動缺乏統合性，各組的運作各自爲政，甚至互不相知。

在這個缺乏領導與統合的組織中，大會在決策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大會是唯一所有參與者認可的決策機制。雖然運動的各個組別各自爲政，但是各組的行動必須經過大會討論並表決通過授權方可執行。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筆者及數位受訪者的觀察，在當時的氛圍下大會幾乎沒有否決任何提案。只要任何參與者想要進行什麼活動（例如蓋靈堂、辦遊行），在大會提案後必定會通過。因此，我們可以說大會是一個將行動正當性授權給各個行動組的組織。

在大會唯一會被否決的，只有撤場的問題。大會上曾不斷出現是否收場的問題，但每次都被群眾否決。野草莓學運歷時一個月之久，與大會不斷否決收場有很大的關係。曾經不斷有參與者（如前述的行政組）想要所有參與者在同

一時間收場，但都會被大會否決。對參與運動失去動力的參與者只能個別地離開，野草莓的運動現場依舊存在，甚至可能有新的人加入。是故，雖然參與者不斷流動、組別也不斷成立與消失，但運動卻能不斷持續下去。

筆者將野草莓學運的組織型態形容爲「無領導的民主行動群」。在野草莓學運的組織中，有一個一個各自行動的群體，可能分別進行靈堂、應付媒體等不同的任務，表面上各個行動群也服膺於大會民主的價值下。然而，這些行動群卻是沒有領導與統合的。民主的大會，只是各自爲政的行動群獲取正當性的決策機構。

三、討論：從「虛擬生態圈」到「無領導的民主行動群」

爲何野草莓學運呈現出「無領導的民主行動群」的型態？筆者認爲虛擬生態圈的動員結構是其關鍵。因爲「虛擬生態圈」的動員特性，出現許多首次參與學運的參與者，且參與者間互不熟識，導致野草莓學運的人際網絡組成枝節分離，而非統一凝聚體。在缺乏統合的人際連帶也無既存組織參考的組成下，運動內部的信任關係難以形成，也因此難以出現多數參與者同意的領導圈，故形成了野草莓學運幹部與群眾的關係。在這樣基礎下，領導者很難取得領導正當性。整體而言，幹部與群眾間幾無權力差距。此現象不但顯現於幹部與群眾之間，在幹部間亦然。野草莓學運組織結構中，沒有任何組別具有領導權，在缺乏統一指揮的組織架構下，各組運作自然與枝節破碎的人際網絡對應。想成立組別的人找自己熟識的小團體，成立後不用聽令指揮，做自己的事就行了。直接民主制的決策模式則是結果：權力分散的結構使得沒有人可以壟斷決策，任何人的決策都不具正當性。唯有所有參與者共同投票決定，方能獲得認可。綜言之，網路動員的角色，推動野草莓學運朝向扁平化、缺乏統合、直接民主的組織型態發展。

上述討論可看到「虛擬生態圈」動員結構對運動組織型態的影響。然而從野草莓學運的案例，更可看出虛擬生態圈動員的一些特色及影響：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首先，生態圈的概念承襲趙鼎新「空間」作爲重要動員結構的概念。在趙鼎新的生態圈概念中，空間本身就可產生連帶，在食堂、宿舍的人產生的連帶，足以成爲動員能量。而網路空間作爲虛擬生態圈，同樣可使在此空間活動的人產生連帶，而產生動員能量。這個特點，使得在台灣現今就算沒有社會運動團體發起動員，但虛擬生態圈內部產生的信任與連帶仍足以產生動員能量。因此虛擬生態圈雖可以產生信任，卻不是一個組織。

再者，虛擬生態圈相對於大眾傳播媒體（如報紙、電視）具有民主參與的可能性。網路媒介的特性，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參與討論。相對地，其他大眾傳播媒體並沒有提供這樣參與的可能性，訊息的傳播被少數人控制（可能是雜誌社幹部、或者花錢買版面的人）。故其他大眾媒體雖能達到動員效果，但由於訊息傳播被少數人控制，關鍵性的少數容易因爲掌握資訊傳播權而獲得相應權力，形成相應的領導圈。而在虛擬生態圈中訊息可由任何人發出，易避免上述現象而產生較無領導圈的參與模式。網路媒介民主參與的特性，複製到了其組織型態中。

值得注意的是，虛擬生態圈只是網路動員的其中一種形式。必須要在網路討論區或PTT2這種強調民主參與的網路空間，才可能構成一種「空間」而形成虛擬生態圈。若是電子報等單向傳播的網路媒介，則沒有空間的形成，也就不能形成虛擬生態圈。電子報、電子郵件等網路媒介應用方式，則使網路媒介僅成爲一種工具，而不是一種獨立的動員場域。

虛擬生態圈將網路民主參與、快速傳播訊息、向不特定對象傳播訊息三種特性帶到了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中。本案例顯現虛擬生態圈確實可以成爲社會運動動員的新形式。即使沒有既存組織透過人際網絡發起動員，網路媒介仍能利用虛擬生態圈產生另一種形式的動員能量。就如在野草莓學運的案例中，雖然校園組織影響力漸趨沒落，但因虛擬生態圈的存在使得運動能夠發起，甚至歷時一個月之久而不散。

虛擬生態圈使得運動的動員成爲可能，但它也對運動的組織型態產生重要

的影響。如前所述，虛擬生態圈產生枝節斷裂的人際網絡，進而使社會運動成員因彼此過往生命經驗重合少，而難以推舉出所有人都信任的領導圈。這將使社會運動的組織型態趨向於「扁平組織，直接民主，統合性低」。

值得注意的是，枝節斷裂的人際網絡並非代表參與者彼此是原子般的個體。筆者並非否定人際網絡對於社會運動動員的重要性，而是強調社會運動參與者的人際網絡組成樣貌因網路媒介的使用而改變。野草莓學運的參與者可能各自動員各自的人際網絡，枝節斷裂指的是這些各自「塊狀」的網絡，彼此各不相干，缺乏統合性。正因缺乏統合性，才影響了野草莓學運的組織型態。

在文獻回顧中提及了1980年代後臺灣學運的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學運團體、異議社團等既存組織扮演了核心角色。運動的發起與動員以既存組織發動或形成聯盟發起動員。運動決策也以既存組織出身的人形成領導圈，主導運動走向。然而野草莓學運中，既存組織既沒有發起學運，在運動中也不見既存組織動員的重要性。運動的多數領導者與學運團體毫無關連，甚至是第一次參加學運。兩相對照之下，可看出虛擬生態圈作爲一種動員結構對社會運動組織型態的影響。

爲瞭解各地野草莓運動與台北的不同，筆者同時訪談了高雄與台中的野草莓學運人士。筆者發現台中與高雄野草莓學運不像台北有高參與的網路平台作爲運動基礎，而多以既有人際網絡爲運動發起與動員核心。台中野草莓起始與結束時間與台北幾近相同，卻不是以高互動高參與的網路平台爲基礎，而是主要以中興大學台文所、靜宜大學台文所的學生爲核心再去動員人力。在人際網絡組成上，參與者生命經驗重合性較高，而非如台北以枝節斷裂、各有來頭的參與者構成。台中野草莓，具有核心幹部圈。幹部圈具決策權力與正當性，決策後很少受群眾挑戰。構成幹部圈的人幾乎都是中興、靜宜大學台文所的學生，並且多曾是中興台文所教授楊翠的學生。楊翠也隱然是台中幹部圈的精神領袖，扮演調解的工作。楊翠自己表示，她就像一個母親，負責照顧運動的學生。高雄野草莓，也呈現類似現象。據筆者訪談，高雄同樣沒有高互動高參與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的網路平台進行虛擬生態圈動員，而是以現實生活的人際網絡傳播資訊。高雄野草莓由少數具社會運動經驗的參與者擔任核心幹部圈，雖然幹部每隔一段時間會改選，但各重要幹部只是在不同職位上面流動，人都還是一樣，權力結構並無太大改變。

對照下，可顯現台中與高雄野草莓在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上與台北場的差異。相對於台北場，台中與高雄野草莓的參與者過去生命經驗的重合性較高，人際網絡較緊密而非枝節斷裂。台中與高雄野草莓也相應產生了領導圈決策。台中與高雄野草莓有此現象的原因筆者無法細訪，但依照本文論點邏輯，可推測虛擬生態圈的有無可能是一個關鍵因素。此外，由於高雄與台中野草莓的發起都是由少數人爲了「響應」台北野草莓而去找人響應動員，筆者推測這些發起者可能容易成爲運動的領導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社會運動史中，並非沒有出現民主式的決策模式。例如野百合學運在廣場上也曾出現民主投票的決策方式，由各校代表討論與投票。然而本案例與過往最不同的是，運動的決策模式不但是民主的，同樣重要的是它的組織型態中沒有辦法產生領導圈，必須用所有人投票的方式決策，沒有代表可以產生。例如運動初期曾試圖組成「七人決策小組」來進行投票決策，甚至這項提案也受許多教授參與者的支持。然而決策小組不能代表群眾，即使獲得了教授的認可，最終也只能解散。野草莓學運最終的組織型態是「無領導的民主行動群」，而在民主的決策機制下形成領導圈、統合參與者。筆者觀察，野草莓學運的組織型態不論是與文獻提及的「新社會運動」，或是台灣曾採取民主式決策的社會運動的組織型態相比，最大不同是野草莓學運根本沒有產生領導圈，且組織型態的統合性極低。在民主的臺灣社會，野草莓學運確實可能受到「新社會運動」以來強調民主參與的意識型態影響。然而正如文獻回顧提到的，組織型態具有許多的樣貌，而非單純科層化與民主化的分別。我們應關注的是民主式參與的形式很多，爲何野草莓學運採取了缺乏領導圈、缺乏統合性的參與模式？筆者認爲網路媒介是上述疑問的答案。

網際網路虛擬生態圈作爲獨立的動員結構，使得即使在既存組織缺席的環境中，民間社會中仍有一種能量使得運動發起成爲可能。我們可以從本案例中更可推廣出一種從動員到組織型態全新的樣貌。

伍、結論

從野草莓學運中的動員到組織，我們看到迥異於以往臺灣社會運動的型態，這樣的型態與網路媒介的使用有絕對關係。筆者嘗試參考台灣1980、1990年代社會運動的動員與組織型態，從中指出野草莓運動與其之差異

既有文獻中指出人際網絡是運動動員的成功關鍵。這種依賴人際網絡動員的方式隱含著要加入運動就必須透過已加入運動的人邀請方可能參加。然而其所指的人際網絡，幾乎是以組織爲基礎的人際網絡動員模式（如NGO、學生社團等）。在1980年代後的臺灣學運中，也可看出組織爲基礎的人際網絡在動員中的重要性。

這種以組織爲基礎的動員模式，使得參與者間的生命經驗較重合、連帶關係也較強。動員的人多半與該組織有所牽連，彼此本來就互相熟識，甚至是長期社會運動合作的夥伴。這種動員模式形成連帶性較強的緊密網絡，其影響有二。

其一，連帶性強的網絡形成的組織型態，易產生領導集團決策，領導集團也易獲得領導的正當性。既存組織動員的運動容易參照既存組織原有的權力關係形成、甚至複製這種權力關係。以臺灣1980年代後的學運爲例，運動領導者不是社團界菁英、校園自治組織的幹部，就是學運團體份子，三者間的成員也有一定的重疊性。

其二是組織內部單位間的統合性較強。由於運動成員熟識，甚至形成了多少具正當性的權力位階，組織內部的信任感及交流也較頻繁，而增進組織統合性。即使各單位意見不合，也因有領導圈，甚至權威存在，可以調停而避免分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裂。

在組織統合性高，且具領導圈的狀況下。運動組織型態較易傾向統合性高，甚至有上下層級式的組織型態。領導圈也佔有較強的決策主導性。

必須釐清的是，雖然具有上下層級的結構，但筆者並非宣稱這是一種「寡頭政治」。運動組織固然可能採取上令下從的菁英式決策模式，但也可能是由民主的方式選擇自己的領導者帶領運動，甚至透過民主程序更換領導者。對比自由之愛的菁英統治，與野百合的民主代表制，就可以印證這樣的現象。

一、網路媒介、「虛擬生態圈」、「無領導的民主行動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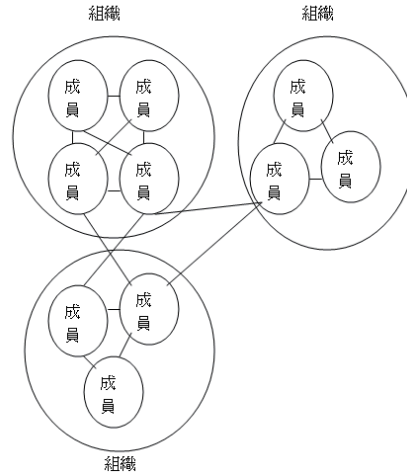
從台北野草莓可看到網際網路「虛擬生態圈」爲主要參與者動員來源的動員結構。學運中，因爲網路高互動高參與低門檻的特性，在網路媒介上就可散播資訊，使任何人都可獲得運動資訊，是一種向不特定對象動員的方式。虛擬生態圈不必依賴既存組織，即可透過網路平台達到動員效果。

虛擬生態圈佔有重要地位的動員結構中，因爲沒有既存組織作爲運動的基礎，動員來的參與者之間往往沒有過往生命經驗的重合。雖然有部份人可能彼此熟識，但整體而言，人際網絡呈現枝節斷裂的情況。兩種社會運動的人際網絡型態如圖四與圖五。

這種新的型態的會帶來新的影響：因沒有既存組織作爲主幹，沒有既存組織的權力關係作參照，運動的權力關係必須重構。然而動員來的人彼此間沒有合作經驗，也較少過往生命經驗的重合，很難有互信的關係，權威很難產生。運動內部少數人的小頭頭未必能成爲全體的領袖。領導圈很難產生，也難有領導正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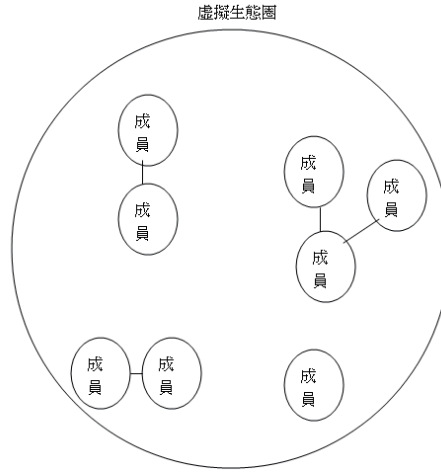
運動組織內部也呈現同樣的狀況，因沒有過往合作基礎，使得枝節斷裂的人際網絡型態複製到組織結構上。組織內部各單位各行其事，任何單位均無法宣稱自己代表整個運動。運動組織的統合性較低，難有一致的指揮。

因爲缺乏領導者，組織內部統合性又低，要決策並獲群眾的同意，唯一的



圖四　以既存組織爲基礎的動員結構，人際網絡關係較緊密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五　「虛擬生態圈」爲基礎的動員結構，人際網絡呈現枝節斷裂的結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辦法就是直接式民主。唯有全體參與者共同決策的情況下，才有可能使運動繼續下去。

然而從野草莓學運的案例中，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在審議式民主的決策模式下充分整合的組織型態。相反地，直接民主成爲各自爲政的小組獲得正當性核可的機制。在民主表決的同意下，各組得以各行其是。因此，這種新的組織型態可稱爲「無領導的民主行動群」。

野草莓學運的組織型態對於運動具有什麼樣的影響？無領導的民主行動群的組織架構下，沒有主導的領導圈決定運動走向，也無法以集體決議的方式結束運動。但正因如此，野草莓運動不斷被注入新的元素（如蓋靈堂、舉辦大遊行），延續運動了的生命。然而，付出心力投入運動的行政、醫療等庶務的幹部，卻沒有獲得更多的決策權力，也引發了運動勞逸不均的問題。不少幹部對於大會的決議表示無奈，卻也只能服從並執行。

可以思考的是，野草莓學運的決策模式是否符合審議民主的精神。在審議民主的價值下，參與者必須投注心力瞭解決策的議題，再進行投票與表決。參與的人數也要到一定的比例才具有決策正當性。然而在野草莓學運的案例中，大會的成員與人數不斷變動，很多參與者只有晚上來參與大會，對於運動持續下去的利弊並不瞭解，就投票決定運動必須持續。此外，有時大會參與的人數只有十數位，然而當天大會的決議同樣具有最高的決策正當性。這樣的決策機制是否符合審議民主的精神，雖非本研究關注的重點，卻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當我們看到社會運動的科技媒介影響動員進而影響組織型態時，反向邏輯是否也成立？雖然本案例沒有辦法處理此問題，但筆者推測，特定的組織型態也會傾向於使用某種動員結構與科技媒介。野草莓學運的組織型態使其選擇不透過既存組織動員，以防權力遭既存組織竄奪。多名受訪者表示希望不透過既存組織動員，並與政黨劃清界限，且不接受各種團體的資助。然而當資助是以個人名義捐贈時，野草莓學運則並未反對這樣的現象。也許野草莓學運既成的

組織型態，使其一直依靠網路動員，而沒有透過既存組織。是故，組織型態也可能反過來對動員結構與媒介使用產生影響作用。

同時筆者認爲，網路社會運動的動員模式並非與傳統動員模式互斥。社會運動者可以利用網路虛擬生態圈動員的可能性，廣召各地不同來頭的運動者。如同我們前面的討論，網路的使用具有降低潛在支持者進入運動的門檻作用。若有傳統模式的既存組織作爲運動發起與籌劃基礎，在增加動員能力的同時，以既存組織爲核心仍可能形成較爲嚴密的組織型態（當然如何統合歧異性更大的參與者將是一個問題）。

最後，野草莓學運是網際網路與社會運動結合的新案例，從本案例可以回答文初的問題：社會運動的科技媒介、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具有什麼樣的關連性？科技媒介本身具有其特性（例如網路高互動、高參與的特性），使得這些媒介特性容易複製到動員過程，影響了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在野草莓學運的案例中，我們看到網路媒介的特性造就虛擬生態圈的動員，而促成無領導的民主行動群的組織型態。當野草莓學運與茉莉花革命的民主浪潮相比，我們同樣可以看到網路動員的重要性、大量的初次參與者、缺乏領導的組織型態等共同的特性。然而正如本文提及的，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特性，其他媒介、甚至是不同的網路媒介可能對於社會運動產生不同的影響。本研究作爲一個探索性的研究，嘗試描繪了網路媒介影響社會運動的其中一種模式。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附錄一：野草莓學運大事紀

時　間	事　　件
2008/11/03-11/04	中國官員陳雲林來台，引發警察執法濫權爭議。
11/05	各校師生於台大社會系館擬定抗議宣言並放置網路上，一夜之間推文者眾。
11/06	行政院前抗議正式開始。 晚上形成初步組織：20人小組，其中七人爲核心小組，教授負責接受諮詢。 糾察、事務、醫療、財務四組出現。
11/07	鎮暴車驅離學運份子，參與者轉戰自由廣場靜坐。 媒體組、活動組成立。
11/08	20人與7人決策小組崩潰，若干決策小組成員改組成爲行政組；糾察線出現、論述組成立。
11/09	學運名稱表決，正式定名「野草莓學運」。
11/10之前	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野草莓場已出現。 野草莓學運LOGO出現。
11/11-11/19	每天早上均有記者會。
11/12-11/13	詢問處成立；靜坐人數銳減。
11/15	北中南野草莓場在台北大會師、案板設立。
11/18-11/19	蓋靈堂。
11/20	靈堂啓用。
11/23	公祭，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到場致意。 草莓塔、小屋完成。
11/25-11/26	野草莓學運幹部改組。
12/07	大遊行。
12/11	警察將強行撤除學運場子。

附錄二：受訪者列表

代號	參與者身份	身　　份	性別
甲	A大學生	幹部	男
乙	A大學生	幹部轉參與者	男
丙	A大學生	靈堂組重要幹部	女
丁	A大學生	幹部	男
戊	B大學學生	參與者	男
己	A大學生	參與者轉決策小組轉參與者	男
庚	C學生	參與者	男
辛	D大學生	參與者	女
子	E大學生	參與者	女
丑	F大學生	參與者，有時兼任工作人員	男
寅	D大學生	幹部	女
卯	海外留學生	參與者轉工作人員	男
辰	社會運動人士	幹部	男
巳	A大學生	參與者	男
午	A大學生	幹部	男
未	A大畢業生	主播組人士	女
申	G大學生	幹部	女
酉	A大學生	幹部	男
戌	A大學生	參與者	男
李明璁	台大教師	野草莓學運發起人	男
楊翠	中興教師	台中野草莓參與者	女
A	H大學生	高雄野草莓負責人	男
B	H大學生	高雄野草莓負責人	男
C	I大學生	嘉義野草莓負責人	男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參考文獻

何明修（2005）。《社會運動概論》。台北：三民

(Ming-sho Ho [2005].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ovement*. Taipei: Sanmin Book.)

批踢踢兔（2008）。〈action1106〉，批踢踢兔。telnet://ptt2.cc。2008/11/29。

(Ptt2 [2008]. "action1106." Ptt2. telnet://ptt2.cc [accessed November 29, 2008].)

李丁讚、林文源（2003）。〈社會力的轉化—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2期，頁57-120。

(Ding-tzann Lee, Wen-yuan Len [2003].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Forces: Organizational Techniques in Taiwan's Environmental Protests."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52:57-120)

林鶴玲、鄭陸霖（2001）。〈台灣社會運動網路經驗初探—一個探索性的分析〉，《台灣社會學刊》，第25期，頁111-56。

(Ho-lin Lin, and Lun-lin Cheng [2001]. "Social Movement Goes Online: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n the Internet Experience of Taiwan's Social Movements."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25:111-56])

范雲（2003）。〈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爲核心的分析取向〉，《台灣社會學》，第5期，頁133-94。

(Yun Fan [2003].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aiwan's Political Transition: An Approach Focused on the Biographical Backgrounds of Activists." *Taiwanese Sociology*, No. 5:133-94.)

苗延威（譯），Della, Porta, Donatella and Mario Diani（原著）（2002）。《社會運動概論》。台北：巨流。

(Della, Porta, Donatella and Mario Diani [2002]. Yen-wei Miao [trans.].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Taipei: Chuliu Publisher)

陳信行（2008）。〈社會運動的組織課題〉，《文化研究月報》，第87期。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87/park00.htm。2009/02/24

(Hsin-hsing Chen [2008]. "Issues of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Cultural Studies Monthly*, No. 87.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87/park00.htm [accessed February 24, 2009].)

趙鼎新（2007）。《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更新和中國經驗》。台北：巨流。

(Ding-xin Zhao [2007].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Taipei: Chuliu Publisher)

鄧丕雲（1993）。《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台北：前衛

(Pi-yun Deng [1993]. *Taiwan's History of Student Movements in the 1980's*. Taipei: Avanguard Publication.)

顧忠華（2003）。〈社會運動的「機構化」—兼論非營利組織在公民社會的角色〉，張茂桂、鄭永年（主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頁1-28。台北：新自然主義。

(Zhong-hua Gu [2003].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ocial Movements: Also on the Role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he Civil Society." In Mau-kuei Chang and Yung-nien Cheng [eds.],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 between Cross Strait* [pp. 1-28]. Taipei: Third Nature Publishing Co., Ltd.)

Brunsting, Suzannce and Tom Postmes (2002).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Small Group Research*, Vol. 33, No. 5:525-54.

Clark, John D. and Nuno S. Themudo (2006). "Linking the Web and the Street: Internet-Based 'Dotcauses' and the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 34, No. 1:50-74.

Dalton, Russel J., Manfred Küechler and Wilhelm Burklin (1990). "The Challenge of New Movements." In Russel J. Dalton and Manfred Küechler (eds.),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pp. 3-20).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arl, Jennifer and Katrina Kimport (2009). "Movement Societies and Digital Protest: Fan Activism and Other Nonpolitical Protest Online."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7, No. 3:220-43.

Fenton, Natalie (2008). "Mediating hope: New Media, Politics and Resist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Vol. 11, No. 2:230-48.

Gould, Roger V. (1997). "Mutilple Networks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Paris Commune, 1871." In Doug McAdam and David A. Snow. (eds.), *Social Movements: Readings on Their Emergence, Mobilization and Dynamics* (pp. 133-44) Los Angeles: Roxbury.

Jenkins, J. Craig (1983).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9:527-53.

Joreen, Jo Freeman aka (1973). "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 *Jofreeman*. http://www.jofreeman.com/joreen/tyranny.htm (accessed March 1, 2009)

McAdam, Doug and David A. Snow (1997). "Motivational Factors I: Barriers to and Correlates of Participation." In Doug McAdam and David A. Snow. (eds.), *Social Movements: Readings on Their Emergence, Mobilization and Dynamics* (pp. 172-73) Los Angeles: Roxbury.

McCarthy, John D. and Mayer N. Zald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 No. 6:1212-41.

Mele, Christopher (1999). "Cyberspace and Disadvantaged Communities: The Internet as a Tool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Marc A. Smith and Peter Kollock (eds.),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pp. 290-310). London: Routledge.

Morris, Aldon D. (1997). "Black Southern Student Sit-in Movement: An Analysi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In Doug McAdam and David A. Snow (eds.), *Social Movements: Readings on Their Emergence, Mobilization and Dynamics* (pp. 90-109). Los Angeles: Roxbury

Noonan, Rita K. (1997). "Women Against the Stat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in Chile'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Doug McAdam and David A. Snow (eds.),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Social Movements: Readings on Their Emergence, Mobilization and Dynamics (pp. 252-67). Los Angeles: Roxbury.

Oegema, Dirk, and Bert Klandermans (1997). "Why Social Movement Sympathizers Don't Participate: Erosion and Nonconversion of Support." In Doug McAdam and David A. Snow (eds.), *Social Movements: Readings on Their Emergence, Mobilization and Dynamics* (pp. 174-89). Los Angeles: Roxbury.

Peckham, Michael (1998). "New Dimensions of Social Movement Countermovement Interaction: The Case of Scientology and its Internet Critics."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3, No. 4:317-47.

Polleta, Francesca (2002). *Freedom is an Endless Mee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lter, Lee (2003). "Democracy,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Internet: A Habermasian Analysis." In Michael D. Ayers and Martha McCaughey (eds.), *Cyberactivism: Online Activ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17-44). New York: Routledge.

Snow, David A., E. Burke Rochford Jr.,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 (1997).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In Doug McAdam and David A. Snow (eds.), *Social Movements: Readings on Their Emergence, Mobilization and Dynamics* (pp.235-51). Los Angeles: Roxbury.

Stein, Laura (2009). "Social Movement Web Us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 Content Analysis of US Movement Websites." *New Media and Society*, Vol. 11, No. 5:749-71.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Zhao, Dingxin (1998). "Ecologies of Social Movements: Student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Beij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3, No. 6:1493-529.

How the internet impacts social movem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Taiwan Wild Strawberry Movement

Yuan Hsiao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ovements, focusing on how the internet affects the mobilization proces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social movement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aiwan Wild Strawberry Student Movement indicates that the internet facilitates a new mobilization process called the "virtual ecology mobilization process". Mobilization through the internet makes social networks in a movement segmented and difficult to create leadership. Thu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becomes "flat" and lacks co-ordination. Mobilization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its consequential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student movements in the past in Taiwan, which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pre-existing organizations. We can conclude that technologies available in a society affect the media means social movement groups can choose to spread information, which influences its mobilization process and consequentially impacts i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echnologies, mobilization processe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re three factors deeply related to one another.

Keywords: the internet, social movements, mobilizati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virtual ecology mobilization process.

Yuan Hsiao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2010.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olitical Sociology, Social Movemen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He conducted a research project fund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sel in Taiwan in 2009.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